

中共對外政策的本質

尹慶耀

〔本文為作者向「第十二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一九八五年三月廿五至廿八日在東京舉行）所提論文，特予選載，藉供參考——編者。〕

一

就一般國家而言，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一個國家的內政、外交，自然與其所處的時代與環境有關，但也不可能悖離其立國精神。而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與其傳統文化密不可分。中共並非中國文化的產物，自又當別論。

中華民國是由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其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①。

已故中國兵學家蔣百里先生在所著「國防論」一書裏指出，中華民族在軍事上取守勢，可以長城為其代表；在文化上採攻勢，可以運河為其象徵。這正說明，「中華民族對於異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廣被以文化」^②。

儒家治國思想，對內行仁政、德治，對外行王道、恕道。對內為政以德，對外以德服人、己立立人。「中庸」一書中，主張「繼絕世，舉廢國」，「厚往而薄來」^③。「孟子」主張仁者「以大事小」^④。「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⑤。中國崇尚王道、輕視霸道，就是這種文化傳統精神的表現。

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⑥。「中國人民一貫把中國革命看作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⑦。這不是中國文化。

註① 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上海：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五年八月滙三一版），二頁。

註② 同註①，五頁。

註③ 「中庸」，第二十章。繼絕世，是替絕嗣的國家立後代，舉廢國，是幫助廢亡的國家復興。厚往而薄來，是指送人的禮要厚、要多，收人的禮要薄、要少。

註④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以大事小，指大國事奉小國。

註⑤ 「孟子」，公孫丑上。以力假仁者霸，是指表面上假仁假義，實際用武力壓迫人，就叫作霸道。以德行仁者王，是指行仁政，以德服人，叫作王道。

註⑥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一四七六頁。

註⑦ 轉引自「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週年」，「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一日）。原註：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的一次講話。

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派胡定斯基 (Grigori N. Voitinsky 中文名吳廷康) 來中國，籌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當時通過的黨章第一條爲：「中國共產黨爲共產國際的一部分，命名爲『中國共產黨』，爲共產國際支部」。

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整個中國大陸之前，毛澤東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他要「強化……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決不施仁政」^⑧。

中共從未放棄世界革命的目標，文革期間且高呼「用槍杆子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⑨。中共的黨，不是中國社會自發的產物。它所信奉的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背道而馳。這是研究中共外交之前，應先具備的認識。

二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淵源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採擷了歐美政治經濟思想的精英，再加上自己的獨見創獲，成爲中國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所致力的一個既能發揚民族文化又能貢獻世界人類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的建立。他的民族主義有大步驟，即：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被壓迫民族全體解放。他主張中國強盛後要「濟弱扶傾」，「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⑩。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發揚。

中華民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一直本着上述的精神進行。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蔣主席與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在開羅舉行會議，當時對於日本天皇制度的存廢問題，蔣主席堅決主張：「日本的國體應該如何，最好待戰爭結束之後由日本人民自己來決定。由於一時的戰爭而干涉他國的國體，將會造成民族間永遠的錯誤」^⑪。在此次會議中，蔣主席即強調戰後應協助朝鮮獨立，同時，鼓勵和協助越南獨立，並恢復泰國的獨立地位。羅斯福總統表示完全同意^⑫。

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中國在南京、臺北、河內受降。同年九月廿八日，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在河內受降，並以中文及越文

註⑧ 「論人民民主專政」，前揭書，一四八〇—一四八一頁。

註⑨ 鍾霄漢：「用槍杆子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駁蘇修集團，反對武裝奪取政權的謬論」，「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

註⑩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民主義」（節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再版），三九頁。

註⑪ 古屋奎二編著：「蔣總統秘錄」第一冊（臺北：「中央日報」中譯本，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一七頁。

註⑫ 吳相湘編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六十三年二月），九三三頁。

發表文告說：「中國軍隊非為越南之征服者或壓迫者，而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¹³。十月七日，中國入越軍政首長奉重慶指示：中國軍在受降繳械遣回日軍後即行撤回。於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中國軍隊於任務完成後，即便撤退回國。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廿五日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一四一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

中華民國所信奉之主義與革命建國的實踐行動，都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的延續與發揚，但中共則完全相反。

中共的辭典中，關於對外政策的解釋是：「一國的對外政策，稱為外交政策。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與它的內政政策分不開的，而一個國家的內政政策則又取決於它的政權性質。……有怎樣的政權就有怎樣的 외교政策，也就只能有怎樣的 외교政策」¹⁴。

中共自命是一個無產階級政權，而「無產階級國家的對內職能是：鎮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的反抗，保障人民民主，保護人民的利益，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逐步清除舊社會的痕跡，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調節人民內部的矛盾，組織人民羣衆進行經濟和文化建設，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對外職能是：保衛自己的國家，防衛外來的侵略和顛覆，支援世界革命」¹⁵。簡而言之，共黨政權對內以鎮壓及強制手段實行社會主義化，對外以顛覆及暴力推行世界革命。中共參加韓戰、支援越戰，在世界各地輸出革命，均屬共黨傳統。

當然，每一個政權，都要先求自保 (Self-Preservance) 以維持其生存，為此它必有某些國家主義的利益；但作為一個共黨政權，它還要推行世界革命，那是它國際主義的義務。史達林在追悼列寧時說：「列寧從來沒有把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當作自在的目的。他始終都把它當作加強西方與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環節，當作促進全世界勞動者戰勝資本的必要環節」¹⁶。史達林解說他的一國社會主義時說：「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的無產者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不可能，——這固然是正確的；那麼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切實，則世界革命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發展，——這同樣是正確的」¹⁷。史達林不僅要求各國無產階級支援蘇聯，他也要把蘇聯建設成一個世界革命的支撐點，共

註¹³ 同註¹²，一一九八頁。

註¹⁴ [新名詞辭典] (上海：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七七頁。

註¹⁵ 北京師範大學等十一所高等院校哲學教材編寫組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問題》(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二二一頁。

註¹⁶ 史達林：「追悼列寧」。[列寧文選]兩卷本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中文版)，二九頁。

註¹⁷ 史達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一五六頁。

產主義運動的根據地。因此，國家主義的利益和國際主義的義務（或利益），並不是相悖的。

毛澤東肯定的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⑩。也說過，中共「要成爲世界革命的兵工廠」^⑪。

共黨政權的戰略策略是隨着時間需要改變的，中共的毛澤東時代已成過去，鄧派且有限度對毛進行批判。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仍爲其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對外政策基本上仍沿襲列寧、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這些都與中國文化無關。

三

中共政權成立前夕，毛澤東認爲「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他宣布倒向蘇聯^⑫。那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但也失去了獨立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大會，黑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過渡」即所謂「三和政策」，主張暴力革命的毛澤東表示異議。那次大會發起的反史運動，更爲毛澤東所不能接受。反史運動引發東歐動亂，一九五七年初，周恩來應黑魯曉夫之請赴東歐收拾善後，其時蘇聯地位降低而中共聲望增高，導發了毛澤東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野心。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爲戰爭與和平問題同蘇共發生爭執，那是對自由世界戰略與策略的分歧。另一項爭論是關於「兄弟黨關係的準則」，中共強調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行聯合的原則，通過協商達到一致的原則」，不能有「上級黨」和「下級黨」之分^⑬。那是對蘇共在國際共黨中的領導地位挑戰。

一九六〇年七月，蘇聯對中共停援並撤退專家，使雙方由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成國家利益的對立。一九六三年七月，中蘇共黨在莫斯科會談改善兩黨關係不成，雙方黨與黨的關係中斷。

中共雖反對蘇共與蘇聯，曾斥之爲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但從未反對列寧主義。實際上，中共執行的正是列寧的世界革命策略。早在一九一六年，列寧就曾明白寫道：黨「主張利用一切反帝民族運動來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⑭。他主張建立無

註⑩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四節標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六五九頁。）

註⑪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的一次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一九七四年七月複製本），六八一頁。）

註⑫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前揭書，二四七七—二四七八頁。

註⑬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四四—四五頁。）

註⑭ 列寧：「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列寧全集》第廿二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三三七頁。）

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盟，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作為戰略口號^②。

毛澤東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所謂世界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在此以後，世界革命就變成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他說：「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③。利用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運動，作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是列寧的策略。將民族問題，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為分水嶺，作前後不同的評價，是學自史達林^④。中共慣用的世界城市與世界鄉村二詞，則借自布哈林 (Nikolai I. Bukharin) 起草，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綱領」。

中共政權成立初期，以反帝先鋒及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進自居。周恩來聲稱中共為共產陣營「在東方的支柱」^⑤。劉少奇則認為中共的「革命道路」，應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主義革命的典型^⑥。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聲言「我們永遠要堅持國際主義，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社會主義的中國將來強大起來，也永遠屬於第三世界」^⑦。

毛澤東說：「民族鬪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鬪爭問題」^⑧。中共把被壓迫民族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聲稱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⑨。

中共只是利用民族問題作達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橋樑，並非為各民族本身利益着想，這和淵源於中國文化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

註② 轉自「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人民日報》及《紅旗》兩編輯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聯合文章。

註③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前揭書，六六四頁。

註④ 參閱史達林：「再論民族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三〇五、三〇六頁。

註⑤ 周恩來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文件》（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一二頁。

註⑥ 劉少奇為紀念中共政權十週年作：「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紅旗》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十月一日出版），一五頁。

註⑦ 胡耀邦講話，《紅旗》一九八一年第十三期（七月一日出版），三七頁。

註⑧ 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鬪爭的聲明」。轉自《毛主席革命外交語錄》（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五一頁。

註⑨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前揭書，一四頁。

主義，毫無相同之處。

四

從中共政權成立至七十年代末，中共對外政策可以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件爲分水嶺，大別爲兩個時期。前一時期以反美爲主，後一時期以反蘇爲重。進入八十年代，就是另一個新的時期。每一個時期，又可細分爲若干不同的階段，但以統戰的手法推展其對外鬭爭，則是始終一貫的。

在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上半，中共指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主張建立最廣泛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強調民族解放運動是防止世界戰爭的重要力量^⑤。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共提出新「中間地帶論」，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是第一中間地帶；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後又加日本——筆者）是第二中間地帶。中共要以第一中間地帶爲主力，聯合第二中間地帶，組成最廣泛的國際反美統一戰線^⑥。當時的中間地帶論並沒有明顯的反蘇字樣，但中共積極籌備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目的却在將美蘇勢力驅逐出亞非地區。第二次亞非會議流產，中共的亞非外交遭受極大的挫敗。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清晨，蘇聯率華約五國軍隊侵入捷克，這一行動震驚了中共，使它不得不轉向美國「投保」以求自存。一九六八年也是美國大選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後，美國也開始圖謀與中共接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已出現反美反蘇統一戰線。七十年代初，中共已開始反對超級大國和霸權主義的鬭爭，而美蘇就是兩超兩霸。不過，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就與中共站在反蘇的共同戰線上。

一九七四年二月，尚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 Kaunda）訪問中共，毛澤東對他說：美國和蘇聯構成第一世界；中間的力量，例如日本、歐洲和加拿大，都屬於第二世界。「我們和你們則屬於第三世界」。

同年四月十日，鄧小平以中共代表團團長身分，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的第六次特別會議中，公開宣布中共的「三個世界論」。他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指稱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也就是中間地帶論中的第一中間地帶，是反霸的主力軍。第二世界是原先的第二中間地帶，仍然具有兩面性，從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擺脫超級大國的

註⑤ 參閱「蘇共領導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上冊，九二～九三頁。

註⑥ 參閱「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社論。

註⑦ 「投保」一詞，出自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Steward J. O. Alsop）。

奴役或控制，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的要求」那一方面看，第二世界是「反霸統一戰線」中可以「聯合」的力量。鄧小平雖然抨擊「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妄圖稱霸世界」。但又說：「在欺負人方面，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超級大國尤為惡劣」^{②4}。

三個世界原是由毛澤東的三句話演化而來。那三句話是：一個世界，兩家子，三分天下。毛澤東分析當前世界，認為有兩種趨勢，一是戰爭引起革命，一是革命制止戰爭，但「當前主要的傾向是革命」^{②5}。所謂一個世界乃是個革命的世界；講革命就只有兩家：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沒有第三家^{②6}。講統戰就可有三個世界的劃分，以便聯多打少。在統戰範疇內，第三世界各國政府都可拉來作反霸的主力軍；在革命範疇內，中共仍支持各國共黨推翻其「反動統治階級」的革命。前者屬於國與國的關係，後者屬於黨與黨的關係。建交不能促使中共保證不支持各國共黨或左翼勢力。

三個世界論是毛澤東統戰外交及世界革命的戰略部署，儘管中共對某些問題的說法與往昔不盡相同，但這項部署基本上並未改變，而「反霸」仍為其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只是當前已不過分強調。

五

雷根 (Ronald Reagan) 總統就任之初，中共對美多所恫嚇，雙方頗多齟齬，蘇聯遂擬從中加以分化。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墨西哥的坎昆 (Cancun) 舉行高峯會議，美蘇對立激化，中共也想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採取有主導性的彈性政策。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 (Leonid I. Breznev) 在塔什干演說，向中共發出改善關係的呼籲，中共也作了溫和的反應。同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二大」，制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鄧小平在開幕詞中，也把一九八〇年一月他提出的八十年代三大任務的順序加以改變，即由反霸、統一、現代化，改為現代化、統一、反霸。

中共當前的外交政策，已在其「外交部」為慶祝其政權成立三十五週年出版的「光輝的成就」一書中的文章加以闡明，文章說：「新中國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作為自己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出發點，在國際事務中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堅持原則，求同存異，不畏強暴，平等待人。我們堅決捍衛本國的獨立與主權，一貫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盡力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不斷發展同其他國家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友好合作關係」^{②7}。

註②4 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發言，見《新華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聯合國電。

註②5 見一九七〇年五月廿日毛澤東為美軍入東發表的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註②6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中共「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所作「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三九五頁。

註②7 中共「外交部」文章，由《瞭望週刊》予以轉載(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關於「獨立自主」方針，中共現歸納為：不依附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不與任何大國結盟。這樣可使中共在政策上保持彈性。不過，中共所說：「在美蘇之間，我們不搞什麼『等距離』，也不『玩牌』」^⑳，不是事實而且恰相反，中共正藉着對雙方玩牌，俾從華盛頓與莫斯科同時獲取實質利益。

中共正同美國發展關係，但以抨擊「臺灣關係法」等為制動器，控制發展速度，以免引起蘇聯懷疑。中共正同蘇聯增進實質關係，但以「三大障礙」^㉑為制動器，控制發展速度，以免引起美國的猜忌。不過，中共聲言它同蘇聯之間的歧見與困難，不應妨礙彼此關係的增進。

胡耀邦聲稱中共屬於第三世界，「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鬭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㉒。中共「外交部」文章，也強調「我們更加鮮明地把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㉓。

中共當前急求現代化，外交方面也予以配合。因而過去一貫強調的「天下大亂」、「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說法，已有所改變。趙紫陽對挪威首相維洛克說：目前世界上戰爭因素存在，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和平因素可以戰勝戰爭因素，世界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㉔。鄧小平對美國使節基金會主席赫伯特·阿姆斯特朗說：戰爭的危險始終存在，美蘇有毀滅對方、毀滅世界的 ability，但不敢輕易動手，和平因素在不斷增長，和平是有希望的。又說：「我們在一心一意搞建設，這就需要在國內保持安定團結，在國際上實現和平與穩定」^㉕。這樣說就動聽得多。

六

中共希望從西方獲取資金與技術，也嘗試學習西方的經營技術與經驗。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美國放寬對中共科技轉移的限制，將它由「P」類輸出管制國提升為「V」類。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國務院和商務部宣布對中共科技轉移的新綱要。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共軍事代表團赴美洽購武器。雷根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共可能接受美國軍艦訪問中國大陸港口。谷牧訪問日本，以及趙紫

註⑳ 同註⑳。

註㉑ 三大障礙為：蘇聯在中蘇邊界駐有大軍；蘇聯侵佔阿富汗；蘇聯支援越南侵略柬埔寨。

註㉒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註㉓ 「瞭望週刊」。(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所刊中共「外交部」文章。

註㉔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日)，第二版。

註㉕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第二版。

陽的歐洲之行，都帶有濃厚的經濟色彩。日本陸續給予中共若干貸款與融資，籌組「對中投資團」，並商談核能合作。西德貸款五千萬馬克，協助中共現代化。中共「副總理」姚依林稱，美商代表團已選定近七十個投資項目與中共洽商投資。本來，中共對外開放政策乃至鄧派政權的穩定性如何，外商不能不加顧慮。官僚主義以及中共制度、法令等條條框框的限制，更使外商多所疑懼。儘管如此，但據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外貿局」局長張岐透露，一九八四年一月到六月底止，中共批准「中」外合資企業一七二家，外商投資總額二億一千萬美元，接近前幾年的總和。又稱，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六月底，中共吸收外資金額共計一五八億美元，其中使用貸款一二五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三三億美元^④。這些外資用之於中國大陸，確屬杯水車薪，但可說明經濟實利是中共當前對外政策的目的之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際」，聲言由於時代變化，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中共當前的所有問題後，對外或可發生一些誘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國務院」決定，在未來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九〇）、第八個五年計劃（一九九一～九五）中，發展經濟主要是依靠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擴建和改建，而不是建設新的企業。「新華社」記者從有關部門了解到，近幾年來，中共工業生產新增的產值中約有三分之二是靠對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取得的。「國家經委」希望各地區、各部門都要充分認識以現有企業技術改造、擴建和改建為方針的重要意義，並在行動中大力貫徹^⑤。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其現有工業交通企業固定資產，役齡在十五年以上的占四二%，二十年以上的占三三%，二十五年以上的占一四%，政權成立以前的占七%^⑥。這些陳舊的企業設備，自然無力全部換新，因而不得不以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擴建、改建為主。而原有企業設備，絕大部分來自蘇聯與東歐，技術改造、加強或是單純的補充零件，都離不開蘇聯與東歐。正是為此，近來中共與蘇聯、東歐加強關係實屬理所當然。中共「十二大」把原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擴大適用於「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係」。那就可以在黨與黨的關係恢復和國家關係正常化之前，先在「和平共處」原則下，與蘇聯及東歐國家增進彼此的實質關係。

據悉波蘭正協助中共重建及開發礦山，合作範圍包括：（一）河北（重建煤礦），（二）山東（開發硫磺等礦物資源），（三）山西（開發煤礦），（四）江蘇（開發煤礦），（五）雲南（開發銅、鋁、鎂等資源）。波蘭已有二十幾位技術專家常駐中國大陸，視雲南礦產勘探進展，將更多派遣技術專家前往。捷克已派遣技術專家協助中共建設山西火力發電廠。匈牙利副總理訪問中共時，同意協助中共整建遼寧省大連市的港口設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匈牙利又與中共簽署衛生、醫療科學合作協定，匈牙利除輸出醫療機械

註④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九月廿日），第七版。

註⑤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電。

註⑥ 任維忠：「固定資產更新改造與經濟振興」。「紅旗」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一月一日出版），三七頁。

、藥品等外，並對中共提供技術合作^④。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與蘇聯的副外長級第三回合「磋商」，據稱即曾討論蘇聯協助中共整修它於五十年代協助中共建造的四大型工廠。又傳蘇聯已向中共提議，願協助中共將截至一九六〇年以前蘇聯援建的工廠、煤炭工業的設備予以更新、現代化。並以重建煤礦為中心，恢復停止了二十年之久工業、科學技術援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 (Ivan V. Arkhipov) 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以及成立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的協議。一九八五年度雙方貿易額已提高到四六億瑞士法郎 (約十八億一千萬美元)，中共「副總理」李鵬應邀於同年四月訪蘇，預定將簽署一九八六至九〇年五年貿易協定，最終年度貿易額將達五〇億美元。

中共從東西雙方爭取援助，以促進其現代化，照理說，它已無暇顧及對第三世界的支援。不過，它永遠不會忘記第三世界在它世界革命策略中的重要地位。雖然在經濟方面，中共對第三世界強調「自力更生」、「南南合作」。但據「新華社」透露，五十年代接受中共援助、合作的共十九國，七十年代達七十國以上。一九八一年墨西哥坎昆南北高峯會議、一九八三年在北平召開「南南會議」以及趙紫陽歷訪非洲十一國，更加强了中共對第三世界的開發援助。一九八四年對六十個國家約有上百件的開發援助，七十件的技术設計合作。另據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統計，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截至一九八三年底，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建設合作計一、〇六二件以上，其中鐵工廠三、纖維工廠五一、砂糖工廠五三、造紙工廠四三、公路建設六、三〇〇公里、鐵路建設三、七〇〇公里、開墾荒地三三、〇〇〇公頃^⑤。由此可見，中共是永遠不會放棄以第三世界為統戰的主要對象的。

七

中共仍藉「臺灣問題」抨擊美國，且指美國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威脅，是以強凌弱的霸權主義^⑥，但那並不妨害它從美國接受資金與技術援助。鄧小平認為蘇聯的對外政策，從黑魯曉夫以來並無改變，但又聲明中共對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的邀請仍然有效^⑦。因而阿爾希波夫訪問北平終於成行，並帶給中共若干實質經濟利益。

註④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六日），第一面。

註⑤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第七面。

註⑥ 「中國新聞社」北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電透露，當日〔人民日報〕的短評有此指責。香港：〔文匯報〕（同月十八日）第三版。

註⑦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鄧小平對日本公明黨竹入義勝一行的談話。香港：〔文匯報〕（同月十二日），第一版。

中共藉東西雙方援助，充實自己的軍經實力，以確保本身的獨立並提高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屬於愛國主義。把自己的建設成果，作為世界革命的支柱，通過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達成埋葬資本主義、支援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屬於國際主義。二者顯然可以並行不悖而互相銜接，那就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

我們絕不可忘記的是：一九八二年九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中報告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⑩。趙紫陽說：「由於超級大國的激烈爭奪，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它們面臨着反對外來侵略、維護民族獨立的迫切任務。我們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鬭爭」。中共「外交部」^⑪文章說：「中國人民正通過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的鬭爭，為加快建設自己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奮鬥」^⑫。共黨所謂「人類進步事業」即指馬列主義革命。建設國家為世界革命的支柱，使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是共黨的觀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僅無關，且有衝突。

我們相信馬列主義無法在中國社會生根，共黨政權傾覆時，共黨式外交政策與策略將隨之而逝，中國文化的光輝，將重新在中國大陸升起。

註⑩ 「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註⑪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趙紫陽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註⑫ 《瞭望週刊》（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所刊中共「外交部」文章。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